

660

清陽文史資料

第十九輯



沈阳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2.9

责任编辑：钱晓岚

沈阳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

(沈阳市沈河区七纬路二十七号)

辽宁省公安厅第二印刷厂印刷

沈文内登第31号

印数1,500册 工本费4.88元

目 录

- 张榕与奉天联合急进会 夏树藩 (1)
杜重远领导的沈阳抗捐风暴 薛景平 (63)
解放战争中的“四纵队”战斗历程片断 王景山 (69)
伪满新学制实施与国民高等学校教育 张景德 (92)
东三省博物馆始末 李凤民 (96)
沈阳解放初期除三害 王景山 (118)
沈阳娼妓改造史话 齐守成 (129)
公私合营使百年药店换新貌 李志群 (157)
首家跨地区的公私合营企业上海私营中央化学
 玻璃厂迁沈合营经过 李志群 (164)
沈阳当代满族的专家学者 姜相顺 (173)
裕瑞与裕德瑞 古 岩 (198)
崇政殿的建筑陈设、维修与用途 贺 萍 (202)
刘尚清 直 心 (208)
王树翰 陈志新 (239)
帅府教习 魏茂林 (266)

张榕与奉天联合急进会

夏树藩

八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时期，在东三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曾涌现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就是东三省资产阶级革命家张榕。张榕不仅是当时同盟会辽东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更是奉天联合急进会的主要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东三省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热烈的响应武昌起义，同清朝在东三省的统治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这样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革命领导人，在他牺牲后的几十年间，却因为东三省一直与张榕等革命势力为敌，并在杀害张榕的凶手赵尔巽、张作霖等的统治下，没有给予张榕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使生活在民国的人，很少注意到这位为创立民国立下大功的人。

解放以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在研究东北地方史和辛亥革命史的时候，才开始对张榕的革命业绩进行了较多的探讨、调查和研究。可是由于时间相隔较长，直接见证人越来越少，使得一些论述张榕的文章，不是记载不够准确，就是互相间有矛盾之处，首先关于张榕的祖籍先人的情况的记载就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因此本文在介绍张榕光辉的一生的时候，就从探讨他家世入手。

张榕的家系

关于张榕的先人情况，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五日的沈阳县公署档案是这样记载的：“张榕，字荫华，先世济南，徙居抚

顺，遂为抚顺人”。而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专门论述辛亥革命时期历史人物的《辛壬春秋》一书说：“张榕，字荫华，号辽鹤，本山东历城人，以父宦於辽、遂籍抚顺”。这是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也是一些文章的基本观点。济南与历城同在山东省境内，而且相距很近，可以说大同小异，即二者都认为张榕的祖籍是山东。不同的是他家什么时候，什么原因由山东到抚顺落籍的。关于这点《辛亥革命与张榕》一文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该文说：“辛亥革命先烈张榕系盛京府汉军镶黄旗人，世居抚顺城东新屯。按清朝制度，汉军镶黄旗人例须在三陵（三陵即新宾永陵，沈阳的福陵和昭陵）当差，所以张家在三陵有固定的袭缺”。也就是说他家是世袭的清三陵护陵官。从以上情况来看，张榕家不是“以父宦於辽，遂籍抚顺”，而是许多年前由山东“迁居抚顺”，在抚顺定居不止一二代人，是“世居抚顺”。这一点主要由张榕家是汉军镶黄旗人和三陵世袭护陵官的职来证实的。

张榕的祖先既然是由山东迁居抚顺的汉人，为什么会获得旗人的身份，并成为清朝信得过的家族，世袭三陵当差呢？这要从清朝的历史发展来找答案。按照清朝制度的规定，汉人要成为旗人是有条件的，第一是清朝辽沈地区时入旗籍的（这些都是原来的东北土著汉人）。第二是清朝入关后响应朝廷号召，报名到东北开垦边田的移民来东北后入旗籍的，第三是明朝与清政权的战争中，因投诚起义而被赏入旗籍的。关于这一点《清史杂考》中有清高宗对于八旗的论述，他说：“在清政权取得中国之前归顺满族的汉人，蒙古人等都可以定为旗人，在八旗例，视为亲你”。张家既然是由山东迁来抚顺的，说明他家不是东北土著汉人，此外也没有关于他家是明朝官兵投城的记载，说明张榕家是清朝初年被移民到抚顺落籍的。

关于张榕家是清三陵世袭当差一事，有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证实。第一张榕的姐姐张桂（原名张焕桂）自幼由其父亲作主许

配给三陵四品官王书铭的独生子王世祺，十七岁出嫁到王家。在封建社会里等级制度森严，最讲究门当户对，正因为王家也是三陵护卫之家，张钦善才有可能将女儿许配给他家，与王家结成儿女亲家。第二是张榕在辛亥革命后，由日本返回奉天，领导革命活动时曾利用三陵中的昭陵（即北陵）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宣统三年清朝密探在其侦察报告中就说查得日前在昭陵四品衙门逃走之肖润芝，初八早回奉，现住张榕家大门里二门外之东厢房”。另一条报告又说：“张榕自关内带回来一有发辫之人，年约三十多岁，现住昭陵卫门，每日由张榕家送饭”。从以上两条可以看出张榕家确实是三陵中的昭陵护卫，否则一般人是不可能把神圣不可侵犯的陵寝重地作为革命据点的。

从以上所证实的张榕家属汉军镶黄旗和为三陵护陵官的情况来看，张家是清初由山东迁到抚顺的，从而可以肯定张榕家的祖籍在山东，而他的原籍在抚顺。

封建的官僚地主家庭

由于张榕家是汉军镶黄旗，又是清朝关外的世袭的三陵护卫，是朝庭信得过的家庭，因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十分得势。

张榕的父亲张钦善，曾在广宁府（即今天的北镇县）作过仓官（即管粮仓的官员）由于很会搜刮，因此虽官职不大而有不小的积蓄。任满后，他没有再回老家抚顺，而是在奉天城买了房子定居下来。据资料介绍，张榕家当时在奉天城内有房子一百多间，在西流水（即现在西丰县）有旱田一千九百二十垧，在奉天城西的西荒有洼地一千多垧，此外他家在通化县大泉眼有一个宝泉涌烧锅（与别人合办），在新宾、抚顺还有粮栈等商号。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张榕就出生在这个封建的官僚地主家庭。张榕在儿童时代正是他家十分得势的时

期，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生活。为了使张榕他们姊妹几个将来能光宗耀祖，高官厚禄，张钦善早早就请来了一个叫马宏的老先生，办起了家庭私塾（因为当时奉天城还没有新式的学校）教他们念书识字。

张榕与哥哥姐姐都很聪明好学，对所学知识都能理解和消化，有时还向老师提出些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老师都解答不了，时间长了，马宏老先生渐渐感到教他们有些力不从心，数年后马宏老先生曾对张桂的干儿子说：“你干妈兄妹的天资太高，我教不了，后来就辞退了这个馆”。这虽然是后话，但反映了当时处于幼年时代的张榕是多么的聪明过人。

马宏老先生辞退私塾的差事之后，张钦善又在老家抚顺请来了一位号称“博学”的老师，他叫张振声，张振声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很正义，在抚顺是个有影响的人物。甲午战败之后，清政府由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中国，特别是在东三省引起了极大震动，导致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爆发。张振声常以“洗刷国耻，振兴民族为己任”，结合文化教育，向张榕兄妹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对于提高他们思想觉悟，以及后来走向革命道路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他们之间不仅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而且成为革命战友。

张榕渐渐长大之后，思想进一步开化，有时走上社会，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国家的残破景象，深深的感到清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同时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想到这些，张榕的学习劲头更足了，除了学好私塾的功课之外，还留心时事变化，同时还学习诗歌、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张榕还拜奉天的技击大师王兰亭为老师，学习武术，很快就掌握了击剑拳术和手枪射击的本领。逐渐成长为一个文武全才的人物，因此他很快就在奉天出了名，并深为人们所推崇。

一九〇〇年七月，沙皇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派十七万六

千侵略军，分五路杀奔辽沈地区，侵入奉天的是第五路。他们打到奉天城之后，就抓住了当时的盛京将军增祺，以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他在屈辱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签了字。后来沙俄又抛出了一个《交收东三省十三条约款》，这些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同时东三省人民也纷纷起来反对，有的组成了武装部队与沙俄周旋，如新宾一带的“忠义军”就曾打击了沙俄军队。

中国政府的拒绝签约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并没有使沙俄放弃奴役中国的“黄俄罗斯计划”。他们继续增兵东三省，并企图永远霸占。对此种侵略行径，不仅激起了东三省人民的强烈不满，也加剧了沙俄与日本以及美英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英国为扶植日本充当自己的伙伴，加强与沙俄的对抗，于一九〇二年和日本签订了第一次《英日同盟条约》。美国为了插足东三省，也积极怂恿日本与沙俄对抗。

一九〇二年四月，沙俄迫于形势，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商定沙俄军队以六个月为一期，分三期撤出东三省。一九〇二年十月沙俄军撤出了辽河以西地区，但是到一九〇三年四月第二期撤军时，沙俄不但不遵守条约规定，按期撤出在盛京（辽宁）辽河以东和吉林的军队，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了七点要求，作为撤军的先决条件。沙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东三省与蒙古一样，做为它的势力范围。沙俄七项要求传出后，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更大的愤怒，各地纷纷集会，反对沙俄的侵略行为，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

面对“俄人谋满日急”，张榕也决心投入到反对沙俄的斗争洪流中去，为了能掌握与沙俄斗争武器，他于这年的春天到北京，考入了京师大堂的译学馆，专攻俄文。

北 京 求 学

张榕考入译学馆后，国内的政治形势进一步严重，特别沙

俄的七项要求大大刺激想独霸中国东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一九〇三年八月至一九〇四年二月，就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所谓“满韩问题”，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谈判。谈判中沙俄要独霸中国的东三省，并要求日本承认朝鲜北纬三十九度线以北为中立地带；日本则要求独霸朝鲜，并容许他插足东三省。由于双方互不相让，终于导致谈判破裂。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夜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指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了旅顺口外的沙俄军舰，不宣而战，次日日本舰队又袭击了朝鲜仁川港外的沙俄军舰，并护送日本陆军在仁川登陆，二月十日日俄双方正式宣战，日俄战争打了起来。

辽东地区由于直接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十分严重，“庐舍为墟，田园荒芜，难民到处流离，啼饥号寒，一片凄凉景象”。

面对着战争给家乡带来的这幅悲惨的情景，再看看清朝政府的反动腐敗，张榕在课堂里再也坐不住了，开始和同学们搞串联，秘密探讨救国救民的办法。当时的北京琉璃厂工艺局的东厢房是他们秘密活动的据点，张榕与一些进步的同学常出入这个地方。

张榕初到北京时，住在东单观音寺的世仁甫（世荣）翰林家里。世仁甫是蒙古族、家住抚顺城北金花楼村，由于博学多才，一八九四年考中进士，以后经皇帝亲自挑选，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之职，因此迁居北京居住。张榕因与世仁甫同为抚顺人，故以乡亲关系住在他家。后来为了搞革命活动方便，张榕借口到译学馆上学路途近，就离开了世仁甫家而搬到沙滩附近的一座庙里住。那里住了不少学生，张榕在此期间结识了同校师范馆的学生丁开璋和朱锡麟等人。同时还结交上一位比他年龄大得多的黄中慧，黄中慧曾经担当过清朝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思想比较进步，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对张榕很有影响。

总之，张榕在北京读书的这个时期，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关心国家大事变为忧国忧民，并且下决心用革命的方式推翻不可救药的清朝反动政权，为此他边学习边广交进步人士，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正如与他年龄相仿的世仁甫二儿子刘仲彝（后改姓刘）后来回忆张榕时说的那样：“几十年以来还没见过象荫华这样气度豪迈的人，他很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扯，带孩子们吃饭馆。他看不起伪善欺世的乡原士大夫，他热烈希望社会的改革。后来他搬到沙滩附近一座庙里住，借口到译学馆的距离近，但用意并不在于此。这庙里住许多学生，对于志同道合的朋友，倾心而谈，是方便的多了，如丁开璋等人可能是这一时期结识的”。

创办保卫公所

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东三省疯狂地进行战争，而清朝政府竟然号称中立，任凭祖国的大好河山被践踏，致使“关外官史畏葸者逃避，贤者亦无能为力，生灵涂炭，财产损失以万万计，无过问者，而大局结果尤不可问”。在这种情况下，张榕与丁开璋、朱锡麟毅然抛弃了学业，离开北京，奔向日俄战争的战场。他们来到硝烟弥漫的东三省后，三个人分头活动，各自组织了反帝反封建的群众组织。

张榕在奉天变卖了一部分家产作为活动经费，然后到兴京和海龙一带，联络地方进步人士王阁臣等组成了地方乡团，创办了“东三省保卫公所”，秘密的名字叫“关东独立自卫军”，上报地方政府备案。由于“东三省保卫公所”是个得到政府同意的保卫家乡，抵御外敌的组织，所以群众纷纷公开参加，队伍发展很快，不长时间就聚集了上万人。他们拟出章程，发表言论，并先后刊登在北京和天津的各种报刊上。他们又传檄绿林好汉，地方豪杰，在誓词中说：“国土存亡，端赖此举，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强邻之野心，为政府之后

援”。张榕家在这一地区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实力，各项活动都开展的比较顺利，所办的团练也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活动来，创造了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新局面。

此间丁开璋创办了“抗俄铁血团”树起了另一支反侵略大旗。

朱锡麟成立了“东亚义勇队”他们都在爱国反帝的旗帜之下建立了武装力量。几个组织的成立与不断壮大，引起清朝地方政府的注意。特别是朝阳邓莱峰团练使他们更是放心不下。朝阳邓莱峰起初办团练得到了清朝地方政府的许可，后来竟然发展成反清的组织。因此清朝政府下令盛京将军增祺查办。这样以来几个组织的活动就都受到了限制。开展反对沙俄的斗争也就没法进行了，在这种情况下朱锡麟因被日本人出卖而被捕，丁开璋逃回直隶，张榕回到了奉天。使刚刚发动起来的反帝斗争的烈火又被扑灭了，几个组织被迫解散。

张榕回到奉天后，仍然受到当局的监视。在亲友们的劝说下，一九〇五年春天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开始到外地考察。经过一年来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东三省广大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尤其是在“奉天大会战”中，日俄两伙强盗投入了六十万军队，两千多门大炮进行厮杀。他们每到一地便抢走大批牲畜，摧毁数以万计的房屋和村庄，糟蹋大片的庄稼，夺去我成千上万无辜同胞的生命。张榕通过实地考察，更进一步了解了帝国主义战争给东三省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更增添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决心。

一九〇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张榕在从营口回奉天的途中，给他的朋友黄秀伯写了一封信，该信中谈到了他的所见所闻，他写道：“沈城附近百里皆误春耕，米庄昂贵为闻所未闻，由辽河到沈阳计九十里，沿途村沿半归一炬，一村中所幸存者仅数间破屋，炮弹或洞其壁，或摩其顶，其余都成瓦砾一片而已”。

张榕决心再到北京去找革命同志，重新投入到新的反对帝

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的伟大斗争中去。

参与炸五大臣事件

一九〇五年夏天，张榕由奉天到北京，他这次到北京没有再到译学馆上学，也没有再到世仁甫家居住，而是又到保安寺去住。到那里后他就着手创办秘密刊物，作为鼓吹革命的阵地。同时他又在天津大丰港内一个已经关业的当铺内，建立了秘密的活动机关，以便了解北京到奉天一带的各种消息。以后又在贾紫垣的隆昌泰米庄设立了普通的通信所，以便于革命信件的收发往来。

张榕这次到北京期间，结识了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安徽桐城的革命党人吴樾。一九〇三年，吴樾与革命党人杨笃生发起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同时他们又是北方暗杀团的成员。当时革命党人内部许多人热衷于搞暗杀活动，因此先后在各地出现了“上海暗杀团”，“支那暗杀团”，“北京暗杀团”和“天津暗杀团”等暗杀恐怖组织。吴樾作为北京暗杀团成员，开始准备暗杀大肆搜刮民财、怨声载道的清朝户部侍郎铁良，因没有杀成而到东三省。后来听说清朝政府准备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瑞方以及商部左丞绍英等所谓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搞假立宪欺骗全国人民，又潜回北京。吴樾决心以自己的行动阻止他们的反动活动。当时在北京有各地为本省人进京办事、食宿方便而设立的会馆。吴樾因为是安徽人，所以就住在桐城会馆。他在会馆住下后即开始打听五大臣出国的时间，要到哪个车站上车及沿途情况。

在北京期间吴樾写了《意见书》，在这篇文章中他揭穿了清政府骗局和自己刺杀五大臣的决心。

吴樾在北京期间常去保安寺，因此与张榕相识，两个人志同道合，一相识即成为革命战友。吴樾将自己要炸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想法与张榕说了，张榕听了之后表示愿助一臂之

力。两个人决定一起行动。

八月二十六日是五大臣出国的日子，一大早吴樾和张榕两个人就到了北京正阳门车站。当时车站已经戒严，两个人都穿的学堂做操的衣服，几次想进入圈内都被阻拦。忽然吴樾发现有些身着无顶纬帽，青褂布靴的官吏仆人打扮的可以进警戒线以内，两个人也急忙买了这样的服装穿上，混了进去。

上午十点钟，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绍英先后到达车站，并且上了为他们准备的花车。见此情景吴樾也带着炸弹尾随而入。可是到了车门口，警卫人员听他不是北方口音，对他产生了怀疑，没有让他上车。正在这时瑞方到了车站，吴樾乘机跟着登上了火车。“至花车夹道中，乃因接驳车辆，车侧人震，弹为冲动，骤然爆发”。炸弹爆炸之后，瑞方的亲随数人被炸死，绍英受重伤，瑞方、载泽、戴鸿慈受轻伤，徐世昌因为距离较远没有受伤。吴樾本人当场牺牲。张榕逃离了现场。

事发后，清朝政府震动极大，一方面他们感到君主立宪的骗局刚一开始就遭到人民的反对；另一方面这次暗杀活动不是发生在别的地方，而是在京城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出现的。对此负有责任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不仅不检查自己失职，反而以此为借口，建议朝廷设立巡警部，以便将防卫京城的军警大权都抓在自己手里。袁世凯为了防止他人插手，向朝廷推荐“徐世昌为该部尚书，赵秉钧为侍郎”，清政府立即照准。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密友，赵秉钧是他的亲信，从此防守京城治安的大权就完全为袁世凯所掌握。

巡警部成立后，袁世凯命令赵秉钧会同从天津借来的侦探长杨以德“协同破案”。巡警们在已死的吴樾身上搜出一张照片，但是因为吴樾当时脸上血肉模糊，所以辨认不出这张照片是死者的，还是其他什么人的。为了搞清死者是谁，是不是照片上的那个人，巡警们将吴樾尸体弄到医院。经过清洗之后，吴樾的面目露了出来，然后拍了照片。两份照片一对照，巡警

们发现吴樾身上的那张照片上的人并不是他自己，而是另一个男人。为搞清问题，侦破这起大案，巡警们决定先从查清死者身份入手，然后再搞清照片上的人。

于是巡警们拿着吴樾的照片在北京城内各处奔走，让人们辨认他到底是谁。当他们来到桐城会馆的时候，一个女子看了之后十分惊讶的说：“此非吴老爷乎？”就这样警方搞清了在车站行刺的是安徽桐城人吴樾。但是在当时还只是警方知道，全国人民并不知道。大约在一个月后《民报》发表了吴樾的《意见书》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位英雄人物的姓名。掌握了死者的身份之后，巡警们又开始四处活动，寻找在死者身上搜出的照片上的那个人。

警方经过侦察发现保安寺是一个“危险人物”聚会的地方，于是对常去那里的人逐个进行秘密的辨认，最后终于发现张榕就是那张照片上的人。但是当时张榕在北京活动用的不是真实姓名，而是化名余本强。于是巡警们开始跟踪张榕的行踪，并发现他就住在保安寺里。晚上张榕发现自己住房外有人活动，知道是对他来的，他大声对外边说：“吾大丈夫也，勿以鼠窃狗偷为！”侦察他的人听屋里这么说便溜走了。

第二天，也就是阴历九月初五，天刚亮杨以德便带领警卒几百人包围了保安寺，然后一部分人气势汹汹的直奔张榕的住处，象逮捕江洋大盗一样兴师动众。张榕见了之后轻蔑的说：

“吾枪在书案下，汝辈何苦张皇乃尔”。说完就从容不迫的穿好了衣服，大踏步的走出了寝室。巡警们搜出张榕的枪之后，才放心的进行搜查，在这里他们搜出了东三省保卫公所章程，以及与吴樾往来的书信等。到这时巡警们才知道张榕的真实身份。在赶回的路上，一个警吏因为佩服这个东三省群众运动的领袖，偷偷地问张榕：“知交中孰能救君者，盍以语之？”榕曰：唯黄中慧耳”。

张榕被押到巡警部后，因为炸五大臣的案子发生在北京正

阳门火车站，因此要由铁路处理。当时京奉铁路总局设在天津，于是将张榕又押往天津，关押到天津模范监狱。

亲友们的营救

张榕被捕后，他的亲友们当天就开始了营救。黄中慧最先得到消息后很是着急，但是一时又不知是什么部门抓的，关押在什么地方。经过了解才知道抓张榕的那伙人，领头的是天津的侦探长杨以德，认为可能是被押送天津了，于是打电报给直隶总督袁世凯，愿以全家人生命担保，请求释放张榕。为了进一步搞清情况，第二天黄中慧亲自乘火车到天津。在天津车站正好碰上张榕的战友贾仲翔也被捕了，黄中慧跳上囚车，混在警卒之中，靠近贾仲翔，告诉他如何应付警方即可无事，然后又打听张榕被关押的地方。贾仲翔告诉他张榕被关进天津模范监狱。得到确切的情况之后，黄中慧才下了囚车，返回北京。

黄中慧回到北京后，立即通知张榕在北京的亲友，并请他们一起设法营救张榕。但是一些亲友见张榕成了朝廷钦犯，案情十分重大，都不敢出面。经黄中慧再三劝说，才有几个人同意参加营救活动。经过几天的奔走，发现朝廷对此案十分重视，不是一般人所能营救得了的。无奈黄中慧只好托自己的父亲黄永思出面。黄永思在官场多年，与慈禧太后的太监大总管李莲英有所接触。黄永思经不住儿子的恳求，答应去试试。

一天黄永思带了重金去见李莲英，托他帮助营救张榕。李莲英得了贿赂之后，答应尽力想办法在慈禧太后面前求求情。一天正好慈禧太后问起刺杀五大臣案子处理的情况，李莲英见机会已到忙说：“张榕是家里的孩子（指张家是汉军镶黄旗），年轻不懂事，请老佛爷恩典恩典吧”！慈禧太后听了也感到张家是关外三陵世袭的护陵官，理应看在这一点上宽恕他，同时

又“悯其幼”，顺手批了个“永久禁锢”，才使张榕免于一死。

除了黄中慧外，出力营救张榕的还有已经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的世仁甫。他得知张榕被捕的消息后，即联合在北京的东三省人士共同保奏，请求释放张榕。此外张榕的姐姐张桂和老师张振声等人也四处奔走营救，并常去天津模范监狱看望，同时也给张榕传递消息一起研究革命事宜。

张榕对于亲友们多方营救，心里十分感动。同时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决心继续奋斗。有一次世仁甫派家里仆人吴安普到天津看望张榕，同时送来了一些物品，张榕当即给写了回信，这封信表达了张榕对亲友的感激之情，也抒发了革命的豪情。信中写道：“不得自由，于今五月，棲迟狱底，时念故人，每欲肃简致候，申纸则不知所书。前安普来，面致尊贻，知公念我，感何可言，弟颤蒙自念，可鄙弃于故乡父老，公犹殷殷为念，弟黑暗之境如得一线光明，快何如之。弟才否德涼，妄思肩巨，致成此恶果，然究非其罪，当蒙见谅于达人也。往事已矣，未复何言，回首前尘，坠欢莫拾，掷壮于凄寂之乡，呜呼苍天，谁实为之，地久天长，此恨庸有亟也。西哲有言为人群谋利益而死者，死有余荣。弟虽在缧绁之中，尚属公罪，无聊之极，借此以解嘲耳。弟事虽有人为之斡旋，前途究多荆棘，如有可乘之机，尚望代为一谋。面壁日深，手足都懒，草此布臆，敬致仁甫尊兄姻大人阁下，即贺晋升侍讲学士之禧，弟名心印，二月二十九日。”给世仁甫这封信是张榕被捕五个月后写的，信中表达了他的革命情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张榕是个比较有名望的人物，不仅有国内人奔走相救，同时也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某国公使亦重其才，欲出面干涉，以意达榕，榕曰：‘康梁竄逸，卖籍偷生，国人羞之，殷鉴在迩，吾尚践其踪耶。卒不允。’”仍然坚持留在国内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而不愿意象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亡命海外，逃